

## 章开沅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田 彤

【摘要】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启蒙催生大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章开沅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比对域外现代化进程，全面梳理中国 1840—1949 年的历史。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章开沅并非盲目采借现代化范式，其学术训练及问题域与现代化理论有相通之处。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不过是其原有研究的延伸与深化。章开沅强调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它本身尚需要具体的、历史的检验与修正。为此，他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在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社会土壤学”，以此阐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独特性。在章开沅的主导下，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均围绕“过渡形态”、“社会集团”、“区域”、“离异—回归”等 4 个范畴展开，以此描摹早期现代化中一系列的“转型”特质；全面勾勒近代官、绅、商、学各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不断变化的、特定时空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历史人物社会角色的多元背景；归纳出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的一般性通则。章开沅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历史现象中“过滤”出上述范畴，是对唯物史观的再阐释与发展，提供了科学运用哲学范畴的新范本，续写史学发展的新谱系。

【关键词】章开沅 中国早期现代化 历史土壤学 过渡形态 社会集团 区域 离异—回归

【中图分类号】K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7)03-0095-12

在中国思想史上，“八十年代”已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段概念，而是指代着新思想、新思维的激情勃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明，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反思过往的历史，试图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探寻中国走向世界之路。经济体制改革，催生大陆知识界的思想启蒙，史学恭逢其时，因其“反思”、“前瞻”特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西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先导。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首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分别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sup>①</sup>“南有章开沅”、“北有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异军突起。较之罗荣渠团队“由世界看中国”，章开沅团队“由中国看世界”，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全面梳理中国 1840—1949 年的历史，比对域外现代化进程，从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诠释了中国百年来早期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及其不断被推迟或阻断的原因，以便当今中国能在相似的历史拐点上，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继续推进现代

化进程。

## 一、范式转换：从中国近代史到早期现代化史

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章开沅采借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并非照抄外国学者的路数，而有其自身学科背景及与西方现代化研究相同的问题域。换句话说，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不过是其原有研究的延伸与深化。

现代化理论源自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变迁思想，在比较社会学、比较人类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文化学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其所惯用的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社会学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均系章开沅所熟知并一贯实践的分析工具。以社会分析为导向，统合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呈现历史复杂而多重的面相，是章开沅一贯坚持的研究取向。他有关理论性的阐释得益于其对史学研究的体悟与反思。章开沅从1960年转入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即开始注重社会环境、社会运动、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其1976年开始主持编纂、1981年出齐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将革命的主体、目标、动力、性质置于整个近代社会中加以考察，是一部综合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民族史、文化史的整体史。但章开沅不满足于此，更希望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系统中，丰富小系统的研究。即使是学术史也“不应只限于人文科学，而应扩大到自然科学。就是人文科学也不应该老是停留于哲学与史学，需要逐步扩大到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诸方面。”<sup>②</sup>张謇历经官、绅、商、学，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参与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立宪、南北调停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早期实业家中具有典型性，研究张謇无疑于检讨一部晚清民初史。章开沅1960年代对张謇及早期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的分析，均立足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及政治表现诸方面。

1980年代初，史学界重新关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时，章开沅主张排除“左”的“突出政治”的干扰，全面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动力与过程。他肯定“阶级斗争”与“两个过程”是探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及其“基点”，在此基础上又引用恩格斯所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有关言论，强调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完整的理解，申明“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就其社会根源和在各个领域的表面而言”，并非仅仅“是游离于中国近代经济、文化之外”的单一性的政治暴力行动，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复合面相。同时，章开沅鉴于民族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两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提出将“两个过程”合并为一条“民族运动”的主线，特别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sup>③</sup>由二而一，删繁就简，并未压缩历史内容，反而予以中国近代史更大的解释空间及可能性。章开沅指出“广义地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其间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sup>④</sup>长期被忽视或否定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和革新派”、“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的洋务派，无不他的着眼点。如此而论，章开沅在领会并尊重“革命史学”的同时，已将中国近代史从“左”的“革命史学”中剥离出来，力求从多侧面、多角度重写全面而自成体系的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在上述研究中体现着丰厚的社会学素养。他求学于金陵大学期间，在马长寿、王绳祖的引导下，已经对社会学动力学与静力学、汤因比的文化生态学、文化力学有初步认识。贝德士对“冲击—反应”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置疑，更是给章开沅留下学术批判精神的种子。接受

历史唯物主义后，则更科学而自觉地坚执社会学的方法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对如何运用社会学考察历史问题已有独到见解。1979年出访美、日，国外同行向章开沅介绍如何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征求其意见。他回答要点有二：“第一，所谓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大家的理解和运用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差异颇大，因此很难给以一个统一的评价。第二，其中有些学者比较重视各个社会集团（或势力）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发掘它们的社会背景，探讨它们政治情绪变化与物质生活方面的利害得失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剖析个案的基础上区分类型。”<sup>⑤</sup>章开沅之所以对社会学方法运用自如，就在于将方法贴合于史实，而非“为方法而方法”。布尔迪厄曾责备法国史学界不接史学“地气”，将社会学“分析范畴过分普遍化，没有深入探索区划和分层的社会历史建构，并时常将它们视为自然之物。”<sup>⑥</sup>相反，章开沅从未不加思考地将社会学范畴应用到史学研究，而是主张把它当作研究路径，并在具体研究中加以验证。从1960年代初开始，他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上已经形成自身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sup>⑦</sup>

章开沅在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尤为倡导比较研究。1979年他发表文章，主张应该加强中外关系研究，“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史学路径与史实有密切的粘连性。因为“辛亥革命也不是在一国之内孤立进行的，它不仅得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有亚洲各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支援，甚至还建立过亚洲和亲会之类带国际性的反帝团体。”<sup>⑧</sup>1980年代初，他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sup>⑨</sup>所谓“上下延伸”，系指考察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变化，寻求历史链条中与研究对象上下关联的因果关系。所谓“横向会通”，涵意有二：或放大研究对象的时空，便于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效能；或比较不同时空相似研究对象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就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论，章开沅主张要将辛亥革命放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总体中考察，又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亚非拉近代民族运动相比较，以此才能回答资产阶级究竟是只有一种模式还是有多种模式。

章开沅“横向会通”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全球史观。全球化是一个史学视界，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即是在勾勒人类文明从“分流”、“合流”、“传染”到“体系”的发生、扩展、互联过程中，反映史学视野的拓展以至全球史的产生。虽然全球史家多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但历史学家则掌握更多的历史文献及判断、解读文献的能力，较之全球史家更有一种优势。<sup>⑩</sup>1980年代以来，章开沅立意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始于对中国近代史实的思考，同时是对费正清“刺激—反应”理论的修正。他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无时无刻不受到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强调要加强中西社会结构（经济、阶级、意识形态）、文教科技、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流派等方面的综合比较研究，呼吁“突破学科界限，从世界史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或者将中外历史的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sup>⑪</sup>章开沅的这种跨文化交际的视野，即“站在中国看世界”，又“站在世界看中国”的视野互换，其目的诚如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所言“跨文化交流应当完成两项任务：一方面，它应将历史思考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通过批判和反思使全球化进程参与历史思考，将历史思考转化为该进程的一种文化生

产力；另一方面，它同时还应当将历史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任务清楚无误地表达出来：即让作为历史固有特性的众多的独特之处出现在该进程中。”<sup>⑫</sup>

由此而论，章开沅的研究背景及学术训练与现代化理论有其内在相通之处，他对现代化理论毫不隔阂，有接受该理论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其富于追索新的理论分析的两重特质，决定他能够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第一，学术创新的意识与精神。章开沅要求自己同时鼓励学者：努力将自身的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接纳、尝试新的方法；进而在研究方法、文风、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形成独特的“家法”。1979年在哈佛大学，他与时任亚洲协会主席的史华慈就此交换过心得，并达成共识。史华慈同样反对把学科变成狭隘的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或“体系”。如果不能从多元视角诠释与深化史实，只能将历史研究引向绝路。章开沅勇于将各类学科引入史学研究，实现科际整合，为史学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他断言“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引进、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的蓬勃生机之所在。”<sup>⑬</sup>第二，对哲学思辨性的偏好。在终极意义上，哲学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元科学，是各学科产生的基点及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的节点。章开沅所追求的史学研究，不仅是“复原”历史“真相”，更要从中提出问题，抽绎出哲学性的思考，引发新的问题的产生。现代化理论本身即是基于多学科之上的宏大哲学框模，满足了他提炼新思想的亟切需要。

历史学家的参与意识及社会使命感，则鞭策章开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植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之中。“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他主张历史学家“力求在辨别各国近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寻求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作为现今‘四化’建设的借鉴。”<sup>⑭</sup>

## 二、现代化理论的“再生产”

现代化理论产生、发展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蔚成高潮，辐射到欠发达、发展中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以各自的理论预设，阐述立论互异的现代化的动力与现代性，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但同时“对‘现代化’也形成若干‘基本一致的看法’”。塞缪尔·P.亨廷顿将其特征总结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革命”；同时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过程。<sup>⑮</sup>然而，随着取样范围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扩展，现代化理论难以涵盖各类繁复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理论遭到来自包括尼日利亚、阿根廷等欠发达国家学者的批评。新儒家理论、依附理论或不发达理论、世界体系论，则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有力质疑。1979年布莱克（C. E. Black）主编的《比较现代化》的出版，标志着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发生重大转变。“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仿效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sup>⑯</sup>英国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在总体上犀利指责过现代化理论的缺弊“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发展理论，它缺乏两点基本内容，一是充分的历史阐释，二是足够的结构分析。从历史角度说，它忽略了大量的历史证据，这些证据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去取代传统的东西；从结构角度说，现代化理论没有揭示诸如引进技术或扩大市场这类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如何受到现存社会关系的制约。并且，构成社会关系的社会权力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在现代化理论中只字未提。”<sup>⑰</sup>此后，有关不同国家、地区的个案研究，

取代了纯粹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为在“历史阐释”中进行“结构分析”，提供了典型而丰富的案例，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对象。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布莱克、利维（M. J. Levy）等合著的《中国现代化》即是其中一部力作。

中国学者开始对本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远早于外国学者。1933年《申报月刊》创刊周年纪念号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征文，集中反映当时中国学者的有关现代化涵义、内外条件、前提、现代化道路选择、产业革命、文化建设等主流观点。1949年后，中共中央虽提出“四化”目标，但因左倾思潮影响，大陆现代化建设及理论研究一度停顿。直至改革开放后，适应中国经济起飞需要，域外各种现代化理论接踵“热销”，大陆的现代化研究再度掀起热潮。

从中外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史来看，从事现代化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域，才可能进一步校验并发展现代化理论。历史学家由于拥有编纂学的训练优长及把握历史非线性因果关系的能力，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支柱。章开沅的史实性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有其内在逻辑关联，自成体系，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

何谓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一般所说的现代化，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持续发展的进程。章开沅明确指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非简单、绝对的“工业化+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作”，有“大体相同的指标体系”：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经济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与行政的科层化、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及社会集团的重组等方面。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重要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素质存在着严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现代化是其内指标体系的平衡发展。

现代化最重要的一环是“人”的现代化，章开沅在这一方面与英格尔斯（Inkeles）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英格尔斯指出“个人心理、价值观朝现代化改变同时会伴随着行为方面朝现代化转变。这些行为的改变，能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赋予真正的意义和生产，并持久地支持住国家现代化方面的转变。”如果社会成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能使自己具备现代人格、现代品质，这个国家就不能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sup>⑧</sup>英格尔斯强调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人的素质上的改变，章开沅更强调营造人的改变的文化环境。这应该也受到他重点研究对象张謇的醒世之论的启发。张謇为促进社会全面变革，曾提出“变习气”说，以为“习气”不变，不仅政治变革，即使一切变革都不可真正开展。“中国之人，莫亟于变习气。然而心肝不变，习气不可得而变也；耳目不变，心肝不可得而变也。”<sup>⑨</sup>在元哲学中，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然而，在历史层面，意识对物质的作用，岂只是“反”作用那么简单。章开沅反复强调，人的现代化并非总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在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它可以而且应该超前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且有力地促进社会现代化。“对于落后于发达国家一大截的中国来说，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现代人文精神的重新构建则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sup>⑩</sup>

现代化进程带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负面产物也如影相随，西方学者对现代化“唱衰”的悲观论即由此而来。章太炎在20世纪之初，已经注意到西方社会暴露出的种种弊端，理性告诫世人：不可盲目迷信进化，进化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章

开沅对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颇有心得，<sup>21</sup>以此观照现代化进程，指出西方现代化创造巨大物质财富，为社会提供福祉，但也制造贫富悬隔、环境污染、道德沦丧、战争屠杀等“人祸”。现代化不全然是“进步”的同义语，不必然是启导社会发展的“回春水”，而是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的利弊相依的互动过程。中国现代化应该引以为诫，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杜绝此类代价。

人类社会有“共相”与“殊相”之别。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的指征及实现的前提确实有许多共性，然而各国与地区都有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结构、市场机遇的差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却千差万别，不能用西欧或北美模式、“儒学+资本主义”的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模式与经验，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地区与国家。章开沅不断申说“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各国必须依据其国情与时空环境，设计切合实际的现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近代以来国人总是跳不出“以夏变夷”或是“以夷变夏”、“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乃至“全盘西化”的窠臼。中国更应该利用“后发”、“外烁型”现代化的优势，总结“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共性，再结合自身“个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sup>22</sup>这一论断与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互为相长。

从理论发生说来看，现代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依据进化论来推导社会发展的原因与路向的学说，均以社会“生产力”与“人”作为立论的基础与社会进步的尺度。现代化理论经过各国学者的修正，研究范围逐渐由单纯研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扩展成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以及军事等多学科的综合体系，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诸如比较研究、社会整合、结构功能分析、区域研究等新的思考路径。布莱克在《现代化动力》一书中提出创见，即以社会整合程度的不同划分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类型。章开沅称布氏方法有助于防止研究中的简单化和某种因素决定论偏向。<sup>23</sup>

现代化理论进入大陆学术界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大有学人不重视现代化理论与“本土经验”的关系，盲目地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或“依附理论”框套中国历史，以致有人戏谑：现代化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章开沅而言，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它本身尚需要具体的、历史的检验与修正。我们既不能把什么问题都用现代化的理念来解读，也不能因现代化理论造成一些误读而因噎废食，对之全盘否定。

唯物史观重视经济因素，但不主张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诚如李泽厚所言“与其说是经济决定论，不如说是经济前提论。”经济是在“最终意义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sup>24</sup>章开沅说过“民族心理的变迁由许多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造成，它往往给阶级意识以深刻影响，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解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答案。”<sup>25</sup>实际上，唯物史观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如果唯物史观被简单的理解为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经济决定论”，那么只能将史学研究引向“公式化”的绝路。

章开沅把唯物史观作为从史实中提出问题、寻找历史联系的最有效的工具。“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但他也强调“如果单纯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也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sup>26</sup>同时，章开沅在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贴合史学研究特点，提出“历史社会土壤学”，在史学研究中发展唯物史观。1982年，他就多次强调加强辛亥革命时期

“社会环境”的研究，“决不能满足于简单地反复记诵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结论，而必须追溯形成这个结论的客观依据和社会历史渊源。”以此克服机械恪守原有定论及教条理解经典理论之弊。1983年8月，他参加《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首次提出“社会历史土壤”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社会环境即国情研究的重要性。其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孙中山的“三种陈土”说。1911年，孙中山反思中华民国政治不良之缘故，指出实系没有掘起和搬开官僚、军阀、政客“三种陈土”。但章开沅指出，孙中山这种“历史土壤表面”认识，未能触及这“三种陈土”的经济、阶级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更为深层次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相反，早期无产阶级者，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才较为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和阶级的实质，最终推翻“三种陈土”。<sup>②</sup>章开沅的所谓“历史土壤”，对中国历史而言，是“国情”，也称为“国内人群的需要”。“国情”决非“社会性质”四字所能完全概括。它包括国土、国民两大方面，涉及资源、人口、国内外市场、社会经济、阶级、政治结构以至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等众多“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sup>③</sup>正如此，他再三表明唯物史观与现代化研究的关系：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与外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获致某些切合实际的有益结论。在此基础上，也才能科学地回答外国学者提出的诸如有关中国近代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中产阶级”等问题，凸显中外现代化的不同脉络。

### 三、研究范畴及其疏证

中国学术界接触现代化理论之初，就开始近代化、现代化概念之讨论。现代化的定义之义，几等于从事研究的人数。“命名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开始。”章开沅没有纠缠于这种“中国特色”的争论，而是采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指代1840—1949年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即1840—1949年的现代化，切实开展具体扎实的研究。将“近代化”从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分离”出来，其意义正如章开沅在“中外近代比较研究丛书”总序中所言：“从历史本身来说，前后连续的过程是很难一刀两断的。特别是所谓近代化与现代化，由于它们都承担了工业化、民主化这样一些基本任务，因而更难作严格的断限。”两者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联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特征。”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近代化”虽然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开端，但由于其内在相关性，却是解析中国现代化的管键与契入点。

以章开沅为领军的课题组，在近十年中，贯穿章开沅的学术思想，先后出版“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罗福惠《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易升运《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唐文权《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范铁城《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赵军《折断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及由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综合性成果《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西欧、日本早期现代化比较，探寻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其后，章开沅的学生又将若干问题延展、深化。21世纪之初，他又将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与张謇对比，不断思考中日近代化不同道路的内在机制及动因。在章开沅的主导下，以上所有研究均围

绕四个“最一般概念”展开：

范畴之一：过渡形态。

D·莱勒（Lerner）在描述现代化时，“不是简单地将社会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模式，而是力图辨出一个中间阶段，即一个过渡性的社会。”<sup>②</sup>以此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联性。罗斯托（W. Rostow）作为经济学家，根据经济指标将所有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大众消费阶段。<sup>③</sup>两者都试图揭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互相缠绕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的过程。章开沅提出“过渡形态”，主要是从梁启超、恩格斯的有关论断中受到启发。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写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话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sup>④</sup>恩格斯从哲学角度说过“一切差异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sup>⑤</sup>两者共同强调新旧转型过程中的“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过渡形态”。章开沅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其中的方方面面都带有过渡性，都内蕴着新旧质素的纷争与消长。他充分体悟到“过渡形态”的解释张力，将此作为一种“元”范畴，描摹早期现代化中一系列的“转型”特质。他首先用“过渡形态”透视张謇，将张謇定位为“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张謇一生经历了由农家子弟到士子、到名士、到乡（官）绅、再到工商资本家的转变。与之大体相应，其政治营垒也由守旧到维新、到立宪、到共和以及回归立宪。张謇的每一次转变，基本上都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和不可预知的或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的社会身份的变化极具“适应性”，而他的观念意识则富有“模糊性”。

马敏作为章开沅的学生，在《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开创性地“将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形成’的总体构想，解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一系列特性。”<sup>⑥</sup>终极意义上解答了中国近代化困局的根源：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即1860—1913年间逐渐成长的绅商，正处于新旧社会经济形态分化过程中，与传统有较强“粘连性”，因而其组织结构与心理结构新旧交织，所从事的近代化终遭失败结局。在《官商之间》一书，马敏将绅商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并在个案基础上，探讨绅商的过渡特征及中介角色，深化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sup>⑦</sup>马敏、朱英还通过大量档案，呈现苏州商会“传统”与“近代”性的“此起彼伏”，并提出中国自己的“市民社会”的范型。<sup>⑧</sup>虞和平发展了马敏的构想，深刻剖析商会结构演化过程中新旧因素并非对立而是相互选择与相互适应的特性。<sup>⑨</sup>“过渡形态”是一种动态社会发展观，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内在细节和过程。

范畴之二：社会集团。

早在1964年，邵循正不满于学术界流行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曾再三向章开沅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章开沅时正对张謇作系统研究，发现简单的阶级归类很难对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作出贴切的解释。1963年他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中，尝试将张謇置于不同群体中加以立论。到撰写《张謇传稿》时，他已经初步形成张謇从下层社会群体向上层社会群体、从旧群体向新群体转化的思路。张謇曾审视自身处境，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力求“通官商之邮”，提出处理好“政、学、业”三者关系。章开沅颇解“个中三昧”。因政治干预，学路中辍。直到1983年8月，他在复旦大学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发言，呼吁加强社会集团的研究。会将具体研究思路形诸于《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

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在当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章开沅以“社会集团”立论，其要点有二：（1）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2）无论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其本身和内部各个领域、各个侧面的结构都是多层次。因此，他强调“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以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许多规定和关系，在集团中间比在个人（或个别企业）身上展示得更为完整和清晰，从而也就更加有利于对阶级、阶层作总体的理论概括。”总之，群体研究可以作为人物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介，同时又可以作为社会总体研究的基础工作。1980年代中后期，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章开沅划分洋务人士为四种类型的群体：一是曾、左、李、张等督抚群体，二是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思想先驱群体，三是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群体，并厘析其角度与功能，高度评介科技官僚群体逐步构建中国现代化最初框架之功“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技专家群体的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成为现实。”

受章开沅影响，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与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商会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乐正对于清末上海人社会心态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浪人研究，无不以“社会群体”为阐释的内在逻辑。其后，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章开沅又主持国家社科“九五”重点课题“近代官绅商学研究”，出版《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一书，全面勾勒近代官绅商学各自群体的与时调适及其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⑤</sup>

范畴之三：区域。

区域史研究是域外学者所长，台湾地区从1973年也已开始了由李国祁、张朋园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论题所及粤、闽、浙、台、苏、沪、湘、鄂、川、鲁、直隶、奉、吉、黑等处。1977年该计划完成后，部分学者转向内陆及边省研究。1980年访美归来后，章开沅强调开展区域史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社会环境的分析框架，区域研究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境外、台湾学者的研究，促进章开沅思考有关理论问题。在经济史领域，他以资产阶级生态来释解“区域”的核心要义。“所谓区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一定空间，而它又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变化着的。”应该突破现行行政区划及近代省、府、州、县的界限，“或以工业地区为中心，或以市场分工为线索，或以江河流域为依据，或以铁路沿线为区分，或以港口商埠为范围”，按照实际经济关系的区划来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比如，东南沿海、西北边陲、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同时，章开沅尤为强调“大区域”中的“小区域”的学术价值。由于近代资料都按行政区划记录，也不妨按省、州、府、县为区域，或在其内再细勘规模更小而联系更为密切的经济区域。比如，南通、盛泽、平望、拱宸桥、佛山、顺德等地。<sup>⑥</sup>章开沅实际在此提出一个具有“通释性”的分析路向，即通过勾连史实的内在关联性判定区域，同时更要变换“场域”，辩证剖析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

人无时不在“区域”之中，“区域”是人生存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章开沅重视人物的“个案”研究，将“区域”引入其中。从发生学来说，人是区域的“婴孩”；反过来，人又对区域产生反作用。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社会层级、经济状况、社会政治秩序等，都型塑

着人的价值观、性格、兴趣、涵养，以及安身立命的职业和交际圈，甚至政治见解。随着人的流动，区域的变换，人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然而在区域转换过程中，最能影响人的应该是包括敌、友的人际关系。“个案”研究，关键的于弄清研究对象的人际网络。我们姑且将“人”与“区域”的关系，称之为“人的区域关系学”。

张謇随人际关系的变换，自青至壮由海门常乐镇到通州、江宁、江阴、朝鲜、日本，中年后更多次往返故里与京城，年近花甲暂居沪上。章开沅将张謇置于不同的区域，令人信服地证明张氏不愧为乡里精英、东南精英、全国精英：张謇在朝鲜才能崭露头角，以致得到“清流”援引，直至状元及第；在通州才能成就大生集团、创造“模范县”；在江苏才能发起“苏社”、江苏教育会，创建筹备立宪公会，营建苏省铁路；在京城才成发动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上海才能调停南北议和。

以区域而非以人际关系为线索，这种将人际关系建基在多元背景之上的人物“个案”研究，极佳地诠释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运用哲学范畴的新范本。

范畴之四：离异—回归。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中的首要问题。其中，学界大多主张从中外文化差异中寻找答案，但各种解答彼此争锋，互不息争。章开沅力求在更深层次上寻找问题的答案，在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以孙中山为个案剖析孙中山与传统文化诀别、取中西文化而融贯的表现及内在缘由，并初步总结人类文化史上“离异—回归”的文化现象。1988年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系统地从史实上构建“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框模。他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思想先驱都曾有过“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就西欧来看，是一种“跨时间”的离异与回归“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就东方而论，是一种“跨空间”的离异与回归“离异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回归表现为从传统文化可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其中，东方国家学习西方文明是一种进步性的离异，但也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既有对抗新文化的守旧复古，又有从传统文化中吸取酵素，以防被西方文化同化，保护民族精神的独立。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调适离异与回归的限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通观世界文化转型，章开沅进而提出“离异”的两种类型：一是“西欧”式离异，其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母体中逐渐孕育诞生”；二是“东方”式的离异，动力则“首先而且主要来自外部”。不过，“东方”式离异仍有其“内在”因素。中国近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离异，“并非全部由于西学东渐的驱动，它也有自己某些内在的渊源端绪。”

尤能引启思考的是，他还提出文化的包容性与排他性以及两者转换的可能性，分析不同国家对世界大势的迎拒的学理。而“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论断，更呈现出“离异—回归”的复杂性、多层次性。<sup>⑨</sup>章开沅从离异过程中还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质间的矛盾，并不逊于异质间的矛盾；强调超越传统文化，克服其中的盲目自傲、大汉族主义乃至宗法、地域观念等消极因素。“离异—回归”概念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学界研究近代儒学、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分析模版。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显然，“离异—回归”是章开沅对“小系统”文化现象的总结。他强调“文化不过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可以对经济社会发挥促进或延缓作用，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发展态势与走向。”通过日本近代化，章开沅“参悟出一个道理”，更为明确地表达这层见解“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结构来孤立地谈论文化。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促成了传统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并使之赢得偏高的评价；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又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畸形扩展则在人类历史上造成奇灾大祸。文化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说到底还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一切社会改革的巨大驱动力；而对于这种驱动力，传统文化的情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抵销，但终究难以阻止它发挥作用。”<sup>④</sup>从“大系统”而言，经济、政治结构等无不是“文化”的一部分，也都存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型制的转化。因此，从“小文化”总结出的“离异—回归”模式，同样也适于对“大文化”系统的社会考察。

有必要交待的是：（1）章开沅总结的各范畴绝非凭空臆断，都是“在场”思考的智慧，即“从历史中来”，又经过具体的、历史的验证。（2）学界都主张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但如何将“发展”落在实处则鲜有建树。章开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历史现象中“过滤”出上述范畴，是对唯物史观的再阐释与发展，续写史学发展谱系。（3）史学研究者虽然尽力践行“价值中立”的原则，但仍然难免不掺杂个人情感、民族情感、意识形态等因素。“价值中立”不是学者主观意识所能完全掌控，必须依靠更多的思考工具。范畴一旦产生，即异化为生产者的对立面，反过来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者自身的“预设前提”。章开沅的早期现代化研究及史学研究，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具有超越时空的批判洞察力、引发学界的整体关注，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范畴规范着他的研究路向。章开沅团队自成“风格”或自成流派，与此不无关涉。进而言之，这些范畴均为“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又是一个可衡量且可操作的标准，一旦成为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分析平台，或可称为“价值公立”，将帮助每个学者实现“价值中立”的主旨。（4）这些范畴还体现在章开沅主导的早期现代化研究中的诸多方面，比如：城市史、心态史、人口史、教会大学史、大众传媒、地理环境、战争等方面的研究，从而避免了以概念、术语或原有定论取代系统的分析，许多曾经被遮蔽的面相得以重新认识。

历史学要在专精深的研究基础上，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并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课题。章开沅由原有知识背景入手，完成了从中国近代史到早期现代化史研究的转变，并以唯物史观校正、拓展了现代化理论，同时从自身学养及学术训练中提出四个范畴，且与弟子一道将此范畴置于中国近代史中加以验证，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新的视角，续写着史学研究的新谱系。章开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堪称富于哲思价值的典范。

①茅家琦也组织弟子完成无锡、南通、常州、扬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长江下游城市的个案研究，1993年推出《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开辟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领域。参见池子华《“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

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②⑨⑩⑰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北京《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③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北京《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④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北京《近代史

研究》，1981年第3期。

⑤ [美] 史扶邻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等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章开沅“中译本前言”，第11~12页。

⑥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⑦ 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

⑧⑨ 章开沅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武汉 《辛亥革命史丛刊》，1979年第1辑。

⑩ [美] 柯娇燕 《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页。

⑪ [德] 约恩·吕森 《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蔡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⑫ 乐正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章开沅“序”，第2页。

⑬ 章开沅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章开沅“总序”，第1、2页。

⑭⑮ [美] 西里尔·E. 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4~47、6页。

⑯⑰ [英] 安德鲁·韦伯斯特 《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38~39、31页。

⑱ [美]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⑲ 张謇 《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载曹从坡、杨桐主编 《张謇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⑳ 郭国灿 《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章开沅“序”，第1页。

㉑ 章开沅 《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北京 《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㉒ 章开沅、罗福惠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

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章开沅“序”，第4、5页。

㉓⑳ 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56、194~195页。

㉔ 李泽厚 《我和八十年代》，马国川 《我与八十年代》，三联书店，2011年，第63页。

㉕⑳ 章开沅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北京 《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㉖ [美] 沃尔特·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页。

㉗ 梁启超 《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上册，上海：广智书局，1909年，第227、229页。

㉘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页。

㉙ 马敏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章开沅“序”，第1、2页。

㉚ 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章开沅“序”，第2页。

㉛ 马敏、朱英 《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店，1993年。

㉜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章开沅“序”，第2页。

㉝ 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章开沅“导言”，第1~2页。

㉞ 章开沅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第1、2、36页。

㉟ 章开沅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第223页。

作者简介：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李振武]

Yat-sen expressed his support for anti-imperialism to the pers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emphasized his belief in democracy and his Christian faith in front of the persons from the Western world, such as the persons from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and proclaimed “One Race, One Culture” in front of the persons from Japan, although he seldom mentioned Pan-Asianism on other occasions. He merely expressed his sympathy to the small Asian nations, such as the Korean people and the Vietnamese people, unless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exerte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 **(4) Zhang Kaiyuan’s Research o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Tian Tong*·95·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search on mainl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Zhang Kaiyuan and his research team analyzed Chinese history from 1840 to 1949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compa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in Chin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As regards the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Zhang did not blindly followed the modernization pattern. Zhang’s academic training permitted him to explore the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his problem domain and the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Zhang’s research o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was the extension and deepening of his initial research. Zhang stressed that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ies should be checked against past experience and revised if necessar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opposed the narrow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put forward the “historical social soil science” which was employed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team led by Zhang conducted a series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ransition forms,” “social groups,” “regions,” “departure and return.” The studies illu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itional forms of early modernization, outl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fficials, gentry, merchants, and literati, presented the ever-changing correlation existing in the specific contexts and the diversified background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concluded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By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phenomena, Zhang developed the concepts mentioned above. His achievemen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provided a new model for scientifically using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has opened a new spectrum of historical studies.

#### **(5)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 A Study Focusing on Bian Zhilin**

*Chen Taisheng*·141·

Bian Zhilin argued that the foreign literature played a catalys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 It was through translation that the Western poetry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Chinese new poetry.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metrical translation, semi-metric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the metrical translation was valued most by Bian Zhilin. Bian Zhilin advocated the theory of metrical verse, and applied the theory to hi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foreign poetry by Bian Zhilin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rical verse in Chinese new poetry. The current